

《中國紅軍在前進》——

回應「左聯」前期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焦慮

◎ 劉小莉

在中外文學史上，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 1892–1950)的《中國紅軍在前進》(*China's Red Army Marches*, 1934)是第一部以中國蘇維埃運動和中國紅軍為物件的文學作品。筆者認為，這部作品的紅色革命主題的形成，與同一時期「左聯」的創作方針密不可分。以下從「左聯」前期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焦慮與史沫特萊蘇區作品的材料來源兩個方面，考察「左聯」前期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觀念對史沫特萊創作《中國紅軍在前進》一書產生的影響。

一 「左聯」前期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焦慮

從「左聯」成立到1931年11月，是「左聯」的前期階段¹。茅盾、馮雪峰等「左聯」共產黨領導人，都曾在這個時期呼喚以蘇維埃運動和紅軍為表現物件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出現。1931年11月，茅盾以施華洛的筆名²，在《文學導報》發表了〈中國蘇維埃革命與普羅文學之建設〉一文。他在文中慷慨激昂地召喚：

我們數十萬革命工農及其先鋒紅軍曾經怎樣用他們的熱血衝散了國民黨白色軍隊的槍林彈雨，在贛南，在鄂北，在豫皖鄂交界，在敵人的屍骸上高舉起我們蘇維埃的大旗來！這一切，這一切，都是我們對於全世界無產階級——快要到來的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有價值的貢獻！這一切，這一切，都一定要在我們作家的筆下表現出來……³

與此同時，由馮雪峰起草、由「左聯」執委會通過的「左聯」前期決議〈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新任務〉一文，將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新任務歸納為六項，其中有兩項涉及蘇維埃運動：

二、在文學的領域內，加緊反對豪紳地主資產階級軍閥國民黨的政權；反對軍閥混戰，特別是進攻蘇維埃紅軍的戰爭；

三、在文學領域內，宣傳蘇維埃革命以及煽動與組織為蘇維埃政權的一切鬥爭⁴。

以茅盾和馮雪峰等共產黨員批評家、作家為首的「左聯」領導人的上述決定，是有其特定政治背景的。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召開，由茅盾、馮雪峰首先宣導，「左聯」在這個時期向全體作家發出創作蘇維埃運動和紅軍題材作品的號召，實際上就是代表整個左翼文藝界向這次大會表態⁵。根據當代歷史學家研究共產國際與中國革

命關係史的成果，1927年以後，共產國際（Comintern）並不瞭解在中國大城市沒有建立蘇維埃的可能，而在中國農村則存在著建立蘇維埃的廣闊前景。共產國際對中國形勢的錯誤估計，先後導致了1927年12月廣州起義的失敗、1930年7月間紅軍進攻南昌、廣州、長沙、會攻武漢等軍事行動的失敗。在此期間，1929年夏發生了中東路事件⁶。

共產國際從蘇聯的國家利益出發，要求中國共產黨迅速行動起來武裝保衛蘇聯、加強軍事活動、擴大遊擊戰爭、以高漲的革命形勢來牽制反動統治階級的反蘇行動。上述要求，助長了由李立三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所推行的一整套冒險計劃，即：以武漢為中心，組織全國中心城市武裝起義，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⁷。1931年2月，共產國際為了確保其方針政策在中國的貫徹執行，由莫斯科中山大學副校長米夫扶植毫無實際工作經驗的王明進入中共中央。王明通過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台後，一方面迷信共產國際的決議、史達林的指示，把它們神聖化；另一方面機械照搬照抄蘇聯共產黨的經驗，把它絕對化⁸。

在這種情況下，史達林和共產國際在指導中國革命中所犯的錯誤不但沒有得到糾正，蘇聯模式反而成為茅盾和馮雪峰所宣導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效仿榜樣和衡量標準，進而引發了他們對中國蘇維埃題材作品的高度焦慮。茅盾認為，蘇聯的十月革命和五年計劃的成功，已經催生了《鐵流》、《毀滅》等普羅列塔利亞文學，而中國自1925年「五卅運動」以來的革命經驗和鬥爭精神、「中國蘇維埃革命偉大的前奏曲」也應該產生屬於它自己的時代的偉大作家⁹。但是他不得不承認，「然而這樣的作品至今尚未產生」。因此，他在文章中反覆慨歎：「我們的作家成為我們的『革命』的不肖子了！」¹⁰。馮雪峰在《決議》中將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在當時的主要任務概括為「反帝國主義、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戰爭以及同時防止右傾機會主義及左傾空談的兩條戰線上的鬥爭」。以這個主要任務為標準來檢查「左聯」的工作，他得出的結論是：它「一方面完成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中部分的歷史使命，然而另一方面卻是顯然的落後，顯然的未能負起主要的積極的任務」¹¹。因此可以預期，在共產國際的領導下，以王明為首的中共中央在1930年代前期所犯的「左」傾錯誤和「左聯」前期共產黨領導對蘇聯的神聖化，勢必使這個時期出現的中國蘇維埃題材的文學作品，從選材、思想立場、表達方式等方面，受到這些錯誤思潮的影響。

但是，由於當時以上海為中心的「左聯」作家缺乏蘇區生活的實際體驗，因此對他們來說，從事上述題材的寫作是違背創作原則的。1931年4月，瞿秋白在看過茅盾的《子夜》前四章初稿和後幾章大綱之後，建議他修改農民暴動和工人罷工的內容，加入描述紅軍和蘇區發展的情節。但是茅盾最終沒有採納這個意見，因為他不願根據「耳食的材料」，寫成概念化的東西¹²。1932年秋冬之間，馮雪峰、朱鏡我陪同從鄂豫皖蘇區到上海治傷的陳賡會見魯迅。陳賡向魯迅詳談了紅軍反圍剿的情形，朱鏡我將相關的油印材料交給魯迅，馮雪峰則說明了希望魯迅寫成一部超過綏拉菲靡維支的《鐵流》的想法¹³。眾所周知，由於缺乏紅軍和蘇區土地革命的生活體驗，魯迅也沒有從事過這方面的創作。更為現實的情況是，國民黨政府在這個時期的文化禁錮，不僅使得蘇區題材的作品難以面世，而且從事這類題材的創作，還會危及相關人員的人身安全和組織機構的繼續存在。茅盾在晚年談及〈中國蘇維埃革命與普羅文學之建設〉一文時也承認，在當時上海那種白色恐怖的環境中，要求作家從事蘇區土地革命題材的創作，是「根本不能辦到」的¹⁴。

所以，為了響應共產國際「第三時期」理論和王明時期中共中央的「革命高潮」號召，「左聯」領導人在確保蘇區土地革命題材作品面世的前提下，也只能尋求變通途徑解決上述問

題。而史沫特萊則具備解決上述困難的主、客觀條件：第一，史沫特萊對「鬥爭哲學」的高度認同¹⁵、她在柏林遭受婚姻和事業挫敗後希望在新的事業中振作起來的心理¹⁶，使她主觀上願意、甚至渴望看到並且通過寫作表現中國底層民眾以暴力反抗壓迫的行動；第二，史沫特萊來華初期為第三國際工作以及對中國現實缺乏深入瞭解¹⁷，使她一方面不可能以批判的態度看待史達林和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干涉，另一方面則能夠接觸到來自第三國際和中共方面的、關於中國蘇維埃運動的材料；第三，史沫特萊作為美國公民所享有的治外法權和在西方出版作品的自由，為中國共產黨的海外宣傳創造了有利條件。根據以上幾點，我們有理由認為，在獲取一定數量素材的前提下，史沫特萊很容易接受「左聯」關於中國蘇維埃運動和紅軍題材創作的主張與要求。

二 史沫特萊獲取紅區資訊的幾個途徑

從筆者收集的資料來看，史沫特萊獲取江西蘇維埃運動和紅軍資訊的途徑，遠不止她自己在《中國的戰歌》(*Battle Hymn of China*, 1943)中所提到的三個方面¹⁸。首先，除過周建屏以外¹⁹，在上海養傷期間向史沫特萊提供有關紅區資訊的，還有陳賡²⁰。而這些紅軍將領與史沫特萊的接觸，則受命於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1932年，奧托·布勞恩受共產國際派遣來華並結識史沫特萊。他在對華回憶錄中指出：

史沫特萊當時正在上海為她的《中國在戰鬥》一書搜集材料，中央委員會的書記們多次為她安排與中央蘇區來的同志會面。她關於蘇區這幾年戰爭真相和情緒的報導，幾乎是逐字逐句記錄下來的，她總是把這些報導讓我先看一看²¹。

由陳賡等人與魯迅會談的史實可以推知，周、陳二人的行為，與「左聯」前期中國共產黨對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設想和期待有著內在關聯。1928—1931年間，陳賡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而史沫特萊在為共產國際工作期間，就是通過中央特科同中國黨建立聯繫的。因此，她很可能在來華不久就認識陳賡，而這一事實牽涉中國共產黨在國統區的秘密工作。《中國的戰歌》於1943年面世，當時「皖南事變」已經爆發，抗日戰爭尚未取得勝利，而史沫特萊本人一直希望再次返華，因此這部作品只在回憶1938年年底史沫特萊與陳賡在山西八路軍抗敵前線重逢時，含混地稱，「幾年前他（陳賡）到上海治傷時，我們曾一起工作過」²²，在關於上海的回憶中，則隻字不提陳賡其人其事。相反，史沫特萊寫作《中國的戰歌》時，周建屏和方志敏已經先後犧牲²³，所以她不僅在書中提到他們的姓名，而且確切地道出了二人在紅軍中的身份、職務。但是這樣一來，史沫特萊紅區題材的作品與「左聯」之間的內在關聯，也被略去了。

出於類似原因被略去的，還有史沫特萊參與創辦《中國論壇》(*China Forum*, 1932–1934, Shanghai)的經歷；這部分經歷也能夠為她提供有關江西蘇區的資料。以1932年1月27日第三期《中國論壇》為例。這一期刊出的〈江西的生活、生計和防禦〉(*"Life, Livelihood and Defense in Kiangsi"*)一文，是先於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而寫的一則宣傳性通訊，文章介紹了蘇區的範圍、政權結構、選舉程式、經濟狀況、工農的生活和工作條件、群眾組織、紅軍的人數、武器配備等，隨文附有華中武裝農民列隊前進的照片。文章在介紹江西蘇維埃政府結構時指出，大量的富農與反革命分子曾混入基層組織中，不過在成立大會召開之前，這些問題都已得到糾正，犯罪分子的破壞被終止，重建工作持續進行²⁴。這

篇文章一方面證實，早在江西蘇維埃政府成立之前，蘇區的「肅反」活動就已經擴大化；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共針對「肅反」擴大化的輿論宣傳活動在「左聯」前期已經開始，且對「肅反」完全持肯定態度。〈武漢落入紅軍鐵圍〉（"Wuhan at Centre of Iron Red Ring", by Franklin Kwong）是為配合王明時期的「中心城市」路線而刊發的。文章傳達了紅軍「不斷勝利」的消息，稱10萬紅軍正在圍攻武漢，他們所遇到的抵抗微乎其微，成千上萬的「國軍」投降²⁵。

三 懸疑：史沫特萊是否親自採訪過江西中央蘇區？

還有一個問題，即史沫特萊在寫作《中國紅軍在前進》之前，是否親自採訪過江西蘇區？1978年以後的中國大陸學者一致同意，史沫特萊沒有到過江西蘇區；她關於江西蘇維埃運動和紅軍題材的作品，其資料來自她在上海對周建屏、陳賡等紅軍將領的採訪。筆者認為，這個觀點最早出自兩位美國史沫特萊傳記作者珍妮斯·麥金農和斯蒂芬·麥金農（Janice R. MacKinnon, Stephen R. MacKinnon）夫婦。1976年，麥金農夫婦在為《中國革命中的婦女》（*Portraits of Chinese Women in Revolution*, 1976）一書所寫的〈序言〉中提出，《中國紅軍在前進》的第一手材料是由在上海養病的周建屏提供的²⁶。1979—1981年，斯蒂芬·麥金農應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邀請，帶領全家在中國住了兩年，從事國際新聞方向的研究生培養工作，同時為撰寫史沫特萊傳記收集資料²⁷。此間和此後，麥金農夫婦介紹史沫特萊生平和創作的譯文，多次出現在中國大陸的學術刊物和會議論文中²⁸。正是通過這些途徑，早在麥氏夫婦所撰寫的《史沫特萊——一個美國激進分子的生平和時代》（*Agnes Smedley: The Life and Times of An American Radical*, 1988）一書問世之前，他們已經在中國傳播了「史沫特萊未去過江西蘇區」、「《中國紅軍在前進》出自她在上海對周建屏等人的採訪」等觀點，中國大陸的史沫特萊研究者也接受了他們的說法。

但是到目前為止，也有一些論者認為，史沫特萊實際採訪過江西蘇區。魯斯·普拉斯（Ruth Price）在《艾格尼斯·史沫特萊的生平》（*The Lives of Agnes Smedley*, 2005）一書中指出，1932年夏，史沫特萊與德國女友索尼婭·庫欽斯基在牯嶺渡過。當時的中共中央委員會（the CCP central committee）為史沫特萊和索尼婭母子提供了住處。史沫特萊每天中午採訪蘇區群眾和紅軍官兵²⁹。普拉斯為這段論述所列的注釋表明，她的觀點，部分出自一部題為《索尼婭報告》（Ruth Werner, *Sonjas Rapport*, Berlin: Verlag Neues Leben, 1977）的德文著作，部分出自1949年日本警方的兩份審訊記錄³⁰。根據普拉斯的陳述，索尼婭是柏林人，出生在一個顯赫的左派家庭，曾經為德國共產黨做過宣傳工作。無獨有偶，在中國大陸學界，張黎於1993年發表的〈關於漢堡嘉夫人——對魯迅日記中一條注釋的補正〉一文，也論及《索尼婭報告》一書。張文主要是對1981年版《魯迅全集》第14卷一處注釋提出不同意見。張曾從一位德國校友處得到德文版《索尼婭報告》一書，其後就「瀛環書店女老闆」問題，與該書作者魯特·維爾納通過信。張黎在這篇文章中指出，魯迅日記中的「漢堡嘉夫人」，是《索尼婭報告》的作者魯特·維爾納；「魯特·維爾納」是這位作家的筆名，其娘家姓庫欽斯基，是當代德國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史學家尤爾根·庫欽斯基的胞妹³¹。2000年，張黎以《謀海憶舊》為題，將德文版的《索尼婭報告》譯為中文。根據魯特·維爾納的回憶，至遲在1932年5月下旬，史沫特萊已經到了牯嶺，7月下旬，她離開索尼婭母子，獨自返回上海³²。為她們安排這次行程的人是理查·佐爾格（Richard Sorge）³³。在回憶錄中，維爾納沒有明確交代史沫特萊是否採訪過紅軍，但是她引用了她本人在1932年7月

5日寫給父母的家信，現摘錄有關內容如下：

艾格尼斯和我每天下午都跑很長的路，欣賞揚子江河谷裏的美麗風光，欣賞湖北那聯綿不斷的山巒，那裏有紅軍。站在這裏的山上便能理解他們的戰術，因為這裏也是荒山野嶺，有著密佈的熱帶叢林。只要山上沒有道路，外來的軍隊是無法發現道路的，只有當地的紅軍在當地農民幫助下才能找到道路³⁴。

維爾納作為事件當事人，她的回憶錄表明，1932年夏天，史沫特萊最少在江西牯嶺一帶呆過2個月左右的時間，而這段經歷，她從未在回憶錄《中國的戰歌》或者私人信件、談話中提及。這究竟是為了保密還是有意回避？如果聯繫史沫特萊在1934年寫成《中國紅軍在前進》的事實，我們完全可以將上引維爾納家信中的「站在這裏的山上便能理解他們的戰術」一句，理解成史沫特萊以避暑為名，在牯嶺一帶體驗江西紅軍的生活，認識他們的戰鬥環境，從而為寫作《中國紅軍在前進》積累素材。接下來的「因為這裏也是荒山野嶺，有著密佈的熱帶叢林」、「只要山上沒有道路，外來的軍隊是無法發現道路的」幾句則表明，兩人是有意遠離遊客聚集的牯嶺療養區，進入叢林密佈、道路複雜隱秘的山地深處的。這為她們接觸、採訪紅軍隊伍創造了條件。而「只有當地的紅軍在當地農民幫助下才能找到道路」一句至少說明，索尼婭和史沫特萊在牯嶺療養期間，即使沒有親自接觸到紅軍，也清楚地知道，牯嶺附近有紅軍活動。綜合上述分析，我們有理由認為，1932年夏天，史沫特萊至少採訪過牯嶺附近的紅軍。但是，就維爾納所說的「每天下午跑很長的路」而言，這種活動很可能是有組織的、事先安排好的小範圍接觸，而不大可能是對紅軍隊伍的大規模實地採訪。

中國大陸公開聲明史沫特萊採訪過江西蘇區的刊物是「孤島」時期的《文匯報》文藝副刊《世紀風》。1938年2月11日—3月21日³⁵，《世紀風》連載了由美懿翻譯的《中國紅軍在前進》前三篇短文〈耒陽城上〉（"From the Walls of Leiyang"）、〈李貴之死〉（"The Death of Li-kwei"）和〈探子〉（"Scouts"）³⁶。之後，譯者美懿因共產黨員的身份暴露，離開上海到了蘇北解放區，連載中斷。3月21日，《世紀風》在該期譯文後面登了一則簡短的附言：「《中國紅軍行進》原文不止這一點。茲因譯者美懿先生離滬暫告結束，即希望讀者見諒。」³⁷。這個附言由主編柯靈執筆³⁸。美懿為這個連載寫了題為〈關於《中國紅軍行進》〉的前言，其中第二節是這樣的：

外國記者熟悉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並曾親入蘇區的主要有二人，其一就是史沫特萊。她最先進入中央蘇區，《中國紅軍行進》就是她在蘇區裏所親見的有血有肉的記錄；另一位也是大家所熟悉的斯諾，他是第一個走進西北蘇區的人，《西行漫記》是他的代表作³⁹。

美懿是梅益常用的筆名之一，是「梅益」的諧音衍變⁴⁰。梅益是長期為《世紀風》寫稿的中共黨員作家之一⁴¹，1938年春，他除了翻譯了《中國紅軍在前進》的部分篇章之外，還著手將英譯本《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譯為中文⁴²，並參加過愛德格·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的翻譯工作⁴³。

這裏的問題是，史沫特萊究竟採訪過江西蘇區的哪些地區，《索尼婭報告》和梅益的說法並不一致。只要查看一下江西省地圖，就不難發現，當時的中央蘇區遠在贛西南一帶；而史沫特萊和索尼婭避暑的牯嶺，作為廬山風景區的一個組成部分，地處贛東北的九江地區。如果以《索尼婭報告》為準，那麼在國民黨軍隊對蘇區實行大規模封鎖和「圍剿」的情況下，史

沫特萊根本不可能「每天下午」從牯嶺出發去採訪中央蘇區，況且這也無法解釋，她訪問的是牯嶺附近，而《中國紅軍在前進》通篇卻圍繞以贛西南的東固地區為中心的中央紅軍來寫。如果以梅益的說法為準，上述問題則可迎刃而解。但是，就筆者手頭掌握的資料來看，中國大陸學者論及史沫特萊到過江西中央蘇區這一事實的資料，僅有上引《文匯報·世紀風》一處，屬於孤證。1937年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 1937, 1938年中譯本將書題譯為《西行漫記》)一書開篇就稱，「自從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的第一個蘇維埃在湖南省東南部茶陵成立以來，還沒有一個人自告奮勇，穿過那道長城，再回來報導他的經歷。」⁴⁴

既然梅益在翻譯《中國紅軍在前進》的同時，也參加了《紅星照耀中國》一書的翻譯，為甚麼他在《文匯報》上的說法與斯諾本人的說法大相徑庭？與此相關的問題是，梅益通過甚麼途徑得到《中國紅軍在前進》的英文版本？他又是根據甚麼資訊，在《文匯報》上公開稱史沫特萊採訪過中央蘇區？在找到進一步的史料證據之前，魯特·維爾納的《索尼婭報告》作為事件親歷者的回憶錄，其中敘述史沫特萊在牯嶺活動的內容，是不能輕易否定的。此外，維爾納在這部回憶錄中明確指出，當她帶著兒子到達牯嶺時，史沫特萊已經在那裏渡過了5周時間⁴⁵。史沫特萊在這5周內的行蹤如何？她是否在這段時間秘密採訪過中央蘇區一帶？看來這個問題還有待進一步研究。梅益從1980年復出到2003年去世前的20多年時間中，曾數次撰文或在接受採訪中憶及翻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和《紅星照耀中國》等書的一些細節，卻對翻譯《中國紅軍在前進》一事緘口。他在晚年的回憶錄中，也曾簡述了翻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和《紅星照耀中國》的過程，但仍然隻字不提他1938年為《文匯報·世紀風》翻譯《中國紅軍在前進》的事實⁴⁶。這是由於遺忘、主觀上認為此事無足輕重，還是有所規避？

筆者認為，澄清史沫特萊是否到過江西蘇區這一問題的重要性在於：如果梅益所說屬實，即史沫特萊確曾採訪過江西中央蘇區，那麼是她，而不是斯諾第一個將紅色中國介紹給了世界。值得注意的是，史沫特萊在《中國紅軍在前進》中所記敘的中央紅軍發展壯大的過程，並非是堅守新聞報導的實事求是原則的「有血有肉的記錄」，而是抹除了蘇區肅反擴大化的災難性後果，創造了「紅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所以，這部作品不僅在實際上成為王明時期中共中央政治宣傳的傳聲筒，而且為江西蘇區的「左」禍提供了佐證。

與史沫特萊不同，斯諾在1936年夏、秋之間訪問保安時，紅軍已經擺脫了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完成了長征，並且開始在西北地方迅速發展壯大。因此，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一書中向世界描繪的紅色中國，是一個由於獲得了再生力量從而蓬勃向上的嶄新社會。就此而言，釐清史沫特萊是否訪問過江西蘇區的事實，就不僅僅是爭論「是史沫特萊還是斯諾第一次將紅色中國的真相介紹給世界」的問題，而是牽涉到他們兩個分別將甚麼樣的紅色中國展現在世人面前，誰的寫作更能體現紅色陣營對自身形象期待的問題。因此，我們暫且假設，1938年的梅益，由於長期在北京、上海等城市生活和工作，不瞭解江西蘇區的實際情況，認為《中國紅軍在前進》是「有血有肉的記錄」。1978年以後，在由「三S研究會」推動的史沫特萊、斯諾研討熱潮中，中國大陸論者普遍同意，《紅星照耀中國》是第一部報導紅色中國的著作⁴⁷。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梅益要繼續堅持史沫特萊親自訪問過江西中央蘇區的觀點，他就必須回答：《中國紅軍在前進》對中央蘇區的書寫是否真實？當然，實際情況到底如何，取決於切實而充分的史料依據。在新的證據被發現以前，本文只能暫時將這個問題擱置下來。

總之，「左聯」前期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焦慮與史沫特萊以江西蘇維埃運動為物件的作品之

間存在著內在關聯。這種關聯體現為：以茅盾、馮雪峰等共產黨員為首的「左聯」領導人號召「左聯」作家創作蘇區題材的作品，響應江西蘇維埃運動；他們的主觀願望和這種願望在實際上不可能實現之間的矛盾，最終是通過中國共產黨向史沫特萊提供江西蘇區資訊、由史沫特萊憑藉她的美國公民和左翼作家身份完成《中國紅軍在前進》一書得以解決的。而史沫特萊本人為第三國際工作的身份、與「左聯」文藝陣營中的共產黨領導人之間的交往，則使她很容易接受「左聯」前期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主張。這些因素共同決定了《中國紅軍在前進》一書服從、服務於1930年代前期中共中央宣傳蘇維埃運動的需要。

註釋

- 1 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中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頁87，109—110，83。
- 2 施華洛：英文「swallow」的譯音，即「燕子」之意。茅盾小名燕昌。參見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中冊，頁81。
- 3, 4, 9, 10, 11 上海文藝出版社編：《中國新文學大系1927—1937》，第一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頁409，418，408—409，409—410，415—416。
- 5, 7, 8 黃修榮指出，中國蘇維埃政權的建立，與史達林和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干涉密不可分。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史達林和共產國際始終反對在中國建立蘇維埃政權，甚至反對在中國宣傳蘇維埃思想。汪精衛叛變後，共產國際對汪精衛和武漢國民黨的幻想破滅，於是便將建立蘇維埃的問題提上了議事日程。參見黃修榮：《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係史》，下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頁121，64—69，109。
- 6 中東路事件：「中東鐵路」是「中國東清鐵路」的簡稱。1896年，俄國從清政府手中取得橫貫中國東北修築鐵路の特權，以縮短西伯利亞鐵路的路程。這條寬軌鐵路連同從哈爾濱到旅順軍港的支線（實際上又縱貫整個東北）到1903年全部完成，命名為「東清鐵路」。俄國的東省鐵路公司又取得沿鐵路兩側數十公里寬地帶的行政管理權甚至司法管理權。於是在東北的心臟地帶出現了一個遠比普通租界規模龐大得多的不受中國管理的「國中之國」，俄國也得以方便地控制整個中國東北地區。1928年，東北軍閥張學良宣佈歸附南京中央政府，中國實現了表面上的統一。1929年7月，張學良的東北政府決心奪回失去的主權、切斷蘇聯對中國共產黨的支持，於是開始驅逐中東鐵路蘇聯職員，查封哈爾濱的蘇聯商業機構，著手收回中東鐵路。同年7月18日，由史達林掌握實權後的蘇聯政府宣佈對華斷交，並命令蘇軍在中蘇邊境黑龍江吉林段準備武裝介入。從8月起，蘇聯軍隊和東北張學良的軍隊接連在中蘇邊境發生戰鬥。10月，中蘇衝突達到高峰。為了贏得勝利，蘇聯和共產國際都希望中國共產黨立即發動武裝起義來保衛蘇聯。中東路事件期間，蘇聯佔據中國領土黑瞎子島，這是日後中俄在領土爭端中最難解決的問題之一。
- 13 包子衍：《雪峰年譜》（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5），頁62。
- 15 史沫特萊認同的是激進的鬥爭哲學。她堅持認為，只要有壓迫，就應該奮起抗爭。她對敢於反叛、抗爭的弱者，不僅寄予同情，而且全力支持。在她心目中，「祖國」並不是指作為個體及其先輩們誕生地和居住地的民族國家、主權國家，而是由覺醒的、敢於反抗壓迫的人們團結在一起的任何一處地方。她的上述立場，主要體現在其自傳體小說《大地的女兒》中。參見：Agnes Smedley, *Daughter of Earth* (New York: the Feminist Press, 1987), 252, 355.
- 16 1921—1928這八年時間，史沫特萊在德國度過。在流亡德國初期，她的非法居留者的身份和語言障礙，使其陷於孤獨寂寞。不久，她與流亡的印度民族主義領袖維連德蘭納斯·查托帕迪亞雅 (Virendranath Chattopadhyaya) 同居。由於二人之間在家庭出身、教育程度、文化、政治、同居生活等方面存在較大的分歧與差異，加之長期貧困交加、顛沛流離的生活，這次婚姻在維繫了大約一年以後破裂。在此期間，史沫特萊也遭到來自印度革命者內部的、針對她性別的人身攻擊，當地的印度革命團體因此而貶低和排斥她。參見：Janice R. MacKinnon and Stephen R. MacKinnon, *Agnes Smedley: The Life and Times of An American*

Radical (Berkeley,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42–86; Ruth Price, *The Lives of Agnes Smedle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60–61, 92–93, 104–107。

- 17 根據魯斯·普拉斯所寫的史沫特萊傳記，1927年，經查托帕迪亞雅推薦，史沫特萊結識了德國共產黨員威利·明曾伯格 (Willi Muenzenberg)，也得知供職於蘇聯駐柏林使館、實際為第三國際下屬的國際聯絡局工作的雅各·馬婁夫—安布拉莫夫 (Jacob Mirov—Abramov)。基於對中國革命的信心，她開始參與第三國際中國方面的工作，但不願意加入任何黨派。1927年年底，蔣介石破壞國共合作，共產國際在中國的影響力下降，蘇聯方面需要調整對華工作方法，安插持美國護照、享有治外法權的工作人員。馬婁夫—安布拉莫夫出面建議史沫特萊前往中國，幫助第三國際建立新的交通線和聯絡方式。普拉斯還指出，由於史沫特萊的無黨派身份要更為可靠一些，所以沒有人要求她加入德國共產黨或美國共產黨。參見：Ruth Price, *The Lives of Agnes Smedley*, 144–161。在中國大陸，一些在1930年代與史沫特萊有過交往的當事人或者相關人員的回憶文字也說明，史沫特萊來華初期確實是為共產國際工作的。茅盾在回憶錄中指出，1930年代初期，史沫特萊名義上是《法蘭克福匯 (日) 報》的記者，實際上在為第三國際工作。參見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中冊，頁68。董仲民在回憶其父董秋斯的文章中指出，1931年，董秋斯和蔡詠裳經過史沫特萊介紹，參加了第三國際東方局的工作，受東方局負責人佐爾格的直接領導；而第三國際東方局在中國直接與周恩來領導的中共中央特科聯繫。參見董仲民：〈憶我的父親、革命文學翻譯家董秋斯〉，《縱橫》，2007年第1期，頁31。
- 18 史沫特萊曾在回憶錄《中國的戰歌》中提到她獲取紅區資訊的三個途徑：一、借助於英文秘書兼翻譯馮達積累了大量關於紅軍的官方剪報，由於這類消息自相矛盾，因而她並不相信；二、1932年「淞滬抗戰」期間，她採訪十九路軍傷兵，其中的一些士兵向她講述過圍剿江西紅軍的親身經歷以及當地的土改情況；三、紅軍初創時期任贛東北紅十軍軍長的周建屏，在史沫特萊上海住處養傷期間，曾向她講述過方志敏創建紅軍的事蹟。參見：Agnes Smedley, *Battle Hymn of China* (New York: Da Capo Press, 1975), 73, 105, 123–124。
- 19 周建屏 (1892–1938)：江西金溪人，名宗堯，字興唐，又名子炎。1909年考入雲南講武堂，並加入雲南新軍，先後參加了護國運動、護法運動以及討伐陳炯明的戰爭。1926年經周恩來推薦進入黃埔軍校學習，參加北伐戰爭。1927年春經朱德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並轉入朱德軍官教導團。1927年參加南昌起義。1929年，被派遣到方志敏領導的贛東北根據地工作，先後擔任紅軍團長、師長。1937年11月，任晉察冀軍區四分區司令員，1938年6月13日，因舊傷復發不治去世。
- 20 Janice R MacKinnon and Stephen R MacKinnon, *Agnes Smedley: The Life and Times of An American Radical*, 157.
- 21 原文如此。史沫特萊所有的中國作品中，並無《中國在戰鬥》一書；而《中國紅軍在前進》一書主要是報導中國紅軍在江西一帶的發展壯大過程的。根據引文中「她關於蘇區這幾年戰爭真相和情緒的報導」一句，可知布勞恩在此處提到的史沫特萊作品，是指1934年面世的《中國紅軍在前進》。1932年春天，布勞恩以共產國際派駐中國共產黨的軍事顧問身份，從滿洲進入中國。同年秋天，他移居上海並認識史沫特萊。參見奧托·布勞恩，李達六、鄭倩伊等譯：《中國紀事：1932–1939》（北京：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頁1、7。奧托·布勞恩 (1900–1974)：德國人，在華期間曾用名為李德和華夫。1932年受共產國際派遣來到中國，任中國共產黨的軍事顧問，積極支持王明的「左」傾路線，是唯一一名參加過長征的外國人。1939年離去，1941–1948年在蘇聯的克拉斯諾戈爾斯克任教。從蘇聯返回東德後，主要從事翻譯工作。1973年出版了對華回憶錄《中國紀事：1932–1939》。
- 22 Agnes Smedley, *Battle Hymn of China*, 194.
- 23 1935年6月18日，方志敏在南昌下沙窩就義；1938年6月13日，周建屏在河北平山去世。
- 24, 25 *China Forum*, Jan. 13, 1932 (Shanghai: China Forum, 1932–), 第四版, 第五版。
- 26 Agnes Smedley, *Portraits of Chinese Women in Revolution*, Edited by Janice R. MacKinnon and Steven R. MacKinnon (New York: Feminist Press, 1976), Introduction 16.
- 27 談鋒：〈麥金農在中國〉，《新聞戰線》，1981年第11期，頁39。

- 28 簡·麥金農、斯蒂夫·麥金農：〈她的筆記錄下中國風雲——紀念史沫特萊誕辰八十九周年〉，《新聞戰線》，1981年第2期，頁40—43；簡·麥金農、斯蒂夫·麥金農：〈艾格妮絲·沫特萊小傳〉，康明強、吳周文譯，《譯林》，1983年第1期，頁246—253；簡·麥金農、斯蒂夫·麥金農，〈中國人民之友——史沫特萊〉，載尹均生、曹毓英主編，《紀念史沫特萊》（北京：新華出版社，1987），頁319—333。
- 29, 30 Ruth Price, *The Lives of Agnes Smedley*, 227.
- 31 張黎：〈關於漢堡嘉夫人——對魯迅日記中一條注釋的補正〉，《魯迅研究月刊》，1993第6期，頁63—64。
- 32, 34 魯特·維爾納：《諜海憶舊》，張黎譯（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0），頁83，81—82。
- 33 理查·佐爾格（1895—1944）：蘇聯特工。1930—1932年間，以德國記者身份，領導其情報小組在中國搜集了大量情報，特別是有關日本侵華計劃的資訊。這些情報成為蘇聯判斷德國和日本戰略意圖的重要參考。1933年秋天，持德國護照、記者證抵達東京，很快打入德國駐日大使館，展開間諜網，向莫斯科提供德日關係及其軍事情報。太平洋戰爭開始前，被指控為蘇聯間諜，遭到逮捕。1944年11月7日，東京監獄對他執行了絞刑。
- 35 其中3月8日因出「三八節」特刊，中斷一天。
- 36 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現代文學研究室，上海圖書館特藏部文獻組編：《上海「孤島」時期文學報刊編目》（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頁20—58。
- 37 美懿將這部作品的書名譯為《中國紅軍行進》。
- 38 《文匯報·世紀風》，1938年3月21日第八版；謝蔚明：〈「我不是中共第一位新聞發言人」——我所瞭解的梅益〉，《世紀行》，2003年第11期，頁45。謝文認為《中國紅軍在前進》一書的作者是「斯諾」，有誤。
- 39 《文匯報·世紀風》，1938年2月11日—3月21日：第四版。
- 40 欽鴻：〈關於王任叔筆名錄的正誤〉，《杭州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8年4月，頁106。
- 41 應國靖：〈「孤島」時期報紙文藝副刊概述〉，載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現代文學研究室、上海圖書館特藏部文獻組編，《上海「孤島」時期文學報刊編目》，頁554，附錄一。
- 42 梅益：〈《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再版後記〉，《俄羅斯文藝》，1980年1月，頁138。
- 43 1938年以「復社」名義出版的中譯本《紅星照耀中國》，為避免國民黨政府的查禁，將書名改為較為隱晦的《西行漫記》。參加這個中譯本翻譯工作的譯者有11人之多。參見胡國樞：〈《西行漫記》的出版與「復社」〉，《學術月刊》，1983年第7期，頁79—80。
- 44 愛德格·斯諾，董樂山譯：《西行漫記》（北京：三聯書店，1979），頁1—2。根據版權項，這個譯本由1937年倫敦維克多·格蘭茲公司1937年英文版譯出。
- 46 楊兆麟：《八十年來家國：梅益紀念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頁17—145。
- 47 周洪鈞認為，「斯諾和他的《西行漫記》，成了美國人和中國共產黨人之間最初精神聯繫的紐帶」。參見周洪鈞：〈《西行漫記》與中美關係〉，《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5年第1期，頁96。陳漱渝持相同觀點。他認為，「愛德格·斯諾是第一位衝破銅牆鐵壁般新聞封鎖進入中國紅色區域的美國記者。」參見陳漱渝：〈《西行漫記》的成就和疵點〉，《齊齊哈爾師範學院學報》，1989年第3期，頁27。

劉小莉 文學博士，現在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博士後流動站工作，研究方向為二十世紀中外文學。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七十八期（2008年9月30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